

白居易诗选

● 顾学颉 周汝昌 选注
●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白居易诗选

顾学颉 周汝昌 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诗选/顾学颉等选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7 重印
(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ISBN 7-02-002444-0

I. 白… II. 顾… III. 唐诗—作品集—中国 IV. 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877 号

书名题签: 沈尹默

责任编辑: 陈建根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9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196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定价 15.00 元

前言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发展到了唐代，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成千累百的诗人那一时期先后出现，他们以各有特色的诗篇，从多方面来反映那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使后来的读者真如置身山阴道上，但见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应接不暇。在那众多的诗人之中，白居易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白居易的诗歌，不仅在数量上比其他任何唐代诗人流传下来的都要多，在内容上反映社会生活也是较为广阔的，而在艺术创作上更显示了他自己的特色。

白居易的诗歌在当时不仅流传于他的朋友之间，在宫廷和民间，甚至在外国也曾广泛地流传过；在唐以后的历史上各阶层的读者中间也有广泛的影响。在今天，白居易的诗歌还有不少篇幅博得了人民的喜爱，人民把它当作祖国文学中的瑰宝，珍视着它，热爱着它，并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作为滋养料，以促进社会主义的新诗歌更加迅速地成长。但是，在那些篇幅浩繁的白居易的诗歌中，也有在今天看来是无益的甚至是

有害的部分，这是必须加以区别和抉择的。为了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祖国的宝贵的文学遗产，我们尝试地编选了这部《白居易诗选》；为了帮助初学者理解这位历史上的杰出诗人和他的诗歌，对于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和产生他的作品的历史条件，我们在这篇前言和有关的注释中也略加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

白居易（公元七七二——八四六年）生活在和我们迥然不同的时代。他诞生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所谓『中唐』时期。他的先世原是大原人，后迁居下邳（今陕西渭南），但他本人却出生在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后又迁居洛阳。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七七二），卒于武宗会昌六年（八四六），中间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个朝代。那曾经是集中的统一和强大的唐帝国，已逐步走向它的下坡路，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封建统治集团正处于分崩离析，即将瓦解的前夕。这中间，虽然有一两个皇帝曾经希图『中兴』，无奈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没落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农民革命的风暴也还没有起来，李唐王朝建国初期对于农民所作的某些让步，某些改良的措施，曾经施行过的一些『仁政』，已经荡然无存。例如，在某种程

度上減輕了人民的一些負擔的「租庸調」法，和行之虽不徹底但对于恢复农业生产仍有一定作用的「均田」制，这时都已遭到了破坏；代替它們的是新的压迫和剝削。大地主的庄园土地日趋集中，以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无立錫之地，农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降为农奴或奴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調」法，剝削是更加殘酷了。此外，还有不少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稅，如「間架稅」、「除陌錢」等，甚至是公开的掠夺，如「宮市」、「白著」……等，真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人民受着煎熬，到处是混乱，到处是黑暗。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正直的詩人能有什么光明的出路呢？

光明的出路是沒有的。

白居易就是在憤激、苦悶和矛盾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白居易度过了他的童年。約当十一、二岁的时候，藩鎮割据的战争烽火迫使他不得不避難越中（今浙江一带），不得不和广大的人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約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曾經一度到长安应试，希望在仕进之途上找到一条出路。他以《賦得古原草送別》一詩初次显示出他的才能，使得老詩人顾况

大为贊賞。可能是由于顧況的推崇，他在當時的詩壇上獲得了一些名聲，可是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這個虛名對他却并無多大的幫助。在污濁而又冷淡的空氣中，白居易在長安住了一些時候，最後仍不得不離去，在漂泊羈旅之中，過着貧困的生活。『孤舟三入楚，羸馬四經秦。昼行有飢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雲。亂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朱陳村詩》），便是他當時生活的寫照。德宗貞元十五年（七九九），白居易又卷土重來，參加進士考試，次年，在他二十九歲的時候，以第四名及第。此後，他又曾參加過幾次科目不同的考試，在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授官盩厔縣尉，開始步入實際的政治舞台。縣尉是封建王朝統治機構中最低級的小官，先于白居易的唐代詩人高適曾擔任過這樣的官職。在這個職位上，一方面對上級的官吏要奔走逢迎，另一方面對屬下的人民却要直接進行壓迫和掠奪。高適曾把這種可厭的官場生活歸納在這樣的两句詩里：『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縣》）。這樣的官場生活，也是白居易所不樂久居的。先于白居易的唐代詩人杜甫也曾經被授予這個官職。杜甫沒有就任，理由是：『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官定後戲贈》）。而白居易，按照當時的科舉出身的一般途徑，就任了這個官職，他被安置在這個可厭的職位上，這自然是無可奈何的事。無怪他發出慨歎說：『始知吏役身，』

不病不得閑。』(《病假中南亭閑望》)但是，在那將近两年的县尉任內，他却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白居易亲眼看到了唐代官僚政治的腐败，亲身体会到了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疾苦，这丰富了他的詩歌創作的源泉。从这时起，白居易真正地开始了他的詩歌創作，写下了象《观刈麦》、《长恨歌》等著名詩篇。元和二年的冬天，白居易被調回长安，又經過考試，授官翰林學士；三年，被任命为左拾遺。这时，白居易除了一般的启奏之外，他更有意識地以詩歌作为手段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張，如他在后来写給他的朋友元稹信中所說的：『身为諫官，月請諫紙，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闕，而难于指言者，輒咏歌之。』(《与元九书》)这里所說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闕』的詩歌指的便是白居易詩歌中最值得注意的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諷諭詩』。这一些『諷諭詩』，大都是在他的諫官崗位上写成的。在这些詩中，他色彩鮮明地表示了他的开明的政治态度和进步的政治主張，他尖銳地揭露了朝廷上的高級官員的巧取豪夺，地方官吏的进奉邀寵以及他們的穷奢极侈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在这些詩中，他特別揭露了由于宦官掌握了当时的軍政大权，他們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种种不合理的措施，和在經濟上极端殘酷的剝削，造成了人民的严重的灾难。詩人的同情是在人民一边的。这一些詩歌在当时曾經发生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使得封建統治階級中的当权派大为不满，如白居易在給元稹的

同一封信中所說的：『凡聞僕《賀雨詩》，而众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众面脉脉，尽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权豪貴近者，相目而变色矣；聞《乐游园》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也就在这个时候，白居易以詩歌为武器，开始参加了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白居易無論从他的政治经历和他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或是从他在启奏中和在詩歌中所表达的政治主張来看，十分明显，他是站在当时以科举出身为其特征的新兴的政治势力方面，而反对以門閥士族壟断朝政的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和握有实际軍政大权的宦官集团的。他的政治立場和政治主張，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但是，他的主張并未得到胜利，不久，他在遭受一連串的打击、排斥和誣蔑之后，在元和十年（八一五）被貶为江州司馬。这在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和創作生活中是一个較为显著的轉折点。这之后，他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改变他的政治态度，但是，他的鋒芒却没有这之前那么显露了，而在某些場合采取了随遇而安、息事宁人、避开尖锐斗争的妥协态度。他几次出为刺史（元和十四年任忠州刺史，穆宗长庆二年任杭州刺史，敬宗宝曆元年任苏州刺史），几次調任朝官，直到他七十一岁的高龄，于武宗会昌二年（八四二）以刑部尚书致仕的时候，虽然他也頗为关心国家的政事，沒有忘記人民生活中的疾苦，并且仍然企图为人民作一些好事（事实上也

作出了一些好事，如在杭州刺史任內，于西湖兴修水利等），但是，他的早年的政治生活中的銳气已是大为减退了。他的出为杭州、苏州刺史，长期求任东都分司，不願在朝，便是竭力避开当时的政爭，希图远禍的表现。白居易在詩里也不諱言这一点。那極言直諫的拾遺風采逐漸消失在「乐天知命」的庸俗的生活状态之中，由元和諫官一变而为「香山居士」和「醉吟先生」。那早年的表达他的强烈的政治观点的「諷諭詩」是不多見了，在他自己所手編的詩集中，「閑适詩」、「感傷詩」、「雜律詩」却占了很大的篇幅，——虽然在这些詩歌中也有一些深刻地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和他的某些「諷諭詩」比較起来毫无逊色；虽然这样的分类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从它們的总的政治傾向上来看，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傾向和两种不同的風格的詩歌了。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問題；这中間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矛盾。

二

任何一个古代的偉大詩人，他的思想和創作都不是單純的而是相当复杂的，白居易自然也是这样。

白居易的詩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內容上和艺术風格上也是多样

的。这反映着他在创作这一些诗歌时的生活和思想的变化情况。从大体上说，在他的早年的作品中，白居易更多地着重于思想内容和题材方面的发掘，而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则更多地着重于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的探求，虽然在他的许多优秀的诗歌中（不论是早年的或晚期的），题材和风格、内容和形式大都是密切结合、和谐统一的。在白居易的创作思想上和生活态度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基本矛盾，这就是「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矛盾。这是一种思想上的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多次地表现出来，而最集中也最完整的表述，则是他的著名的《与元九书》中的一段话，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僕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終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諷諭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覽僕诗，知僕之道焉。其余「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白居易在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他对于出处进退、立身处世的见解；在这里，他又谈到了对于自己诗歌的看法；同时，他也说明了他的「奉而始終之」的「道」和「言而发明之」的「诗」的关系。这样的一个矛盾，在他的思想中和创作中是长期地并且

也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只是它的表現的形式时有不同而已。大致看来，在他的創作的早期，在写《新乐府》和《秦中吟》以及其它的「諷諭詩」的时候，在他的思想里，「兼济」的思想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而当他处在无可作为，无法施展政治抱負的时候，或是在政治上遭受到打击或排斥的时候，特别是在他的暮年，飽食閑居，皈依佛教的时候，「独善」的思想则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在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場合，不論是在他的「諷諭詩」、「閑适詩」、「感傷詩」或「杂律詩」中，「兼济」和「独善」的思想則是互相掺杂在一起并且又是互相矛盾着的。当他看到了在烈日炎炎下拾麦穗以充饥腸的农妇的时候，在他写《观刈麦》的时候，他想到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祿三百石，岁晏有餘粮；」他感到了內心的愧疚：「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他想到要为人民做一些好事。当他穿上了新制的布裘的时候，他「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他认为：「丈夫貴兼济，豈独善一身；」他产生了这样的願望：「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布裘》）他在諫官的崗位上，固然写出了象《新乐府》、《秦中吟》之类的「兼济」的詩，当他遭受到打击的时候，在他的轉徙生活中，路过洞庭湖时也写下了《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这样的詩。在这首詩中，他想到了当时如果能有大禹这样的人出現，化水患为水利，来解除人民的疾苦，那是如何的好啊！他即

使是在生命快要結束的時候，在那夾雜着很濃厚的佛家思想的《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中，也還沒有忘記那一些『大寒之月，裸跣水中，飢凍有聲，聞于終夜』的舟子；當他想到自己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時，便感到『適願快心』。從总的傾向上看，在『兼濟』和『獨善』的矛盾中，『兼濟』的思想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白居易的這一些願望，自然是善良的願望，但是，在當時，却是無法實現的；或者即使在某一項具體的措施中，一点一滴地實現了，但是，他的這一些善良的願望，也是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的。這便是他之所以在思想上發生矛盾，在生活中感到苦悶的根本原因。造成這個根本原因的，歸根到底，我們應該歸之于黑暗的封建制度的罪過，封建統治階級的罪過。要實現詩人理想中的這一些善良的願望，要達到『兼濟』的目的，那就必須從根本上廢除封建主義的一切反動制度以及它的許多措施，推翻整個封建統治階級，打倒這個階級的最高的代表人物——皇帝，而這一切，在當時，都是詩人白居易所不曾夢想到也是他不會夢想到的；與此相反，他把解除人民疾苦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王朝最高統治者皇帝身上，希望他施行『仁政』，那怎么能辦得到呢？白居易雖然同情人民的疾苦，但他卻不理解同時也不可能理解造成這疾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他更不可能從積極的意義上估計人民的力量，當然他也就不可能在政治鬥爭中從人民方面取得對他的支持。這

一切，在当时，都是詩人白居易很难想象得到的。白居易的思想矛盾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反映，他苦恼，憤激，徘徊，妥协，他缺乏坚决斗争的勇气，以至于頹唐，……这一切便是阶级和时代对于他的限制，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白居易的愿望是善良的，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他的心情是苦悶的。在他的思想中，有儒家的某些进取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道家的退让的清静无为的、以至于佛家的悲观出世、因果报应思想的消极的一面。在他的实际生活中，白居易有他的勇敢的一面，也有他的懦弱的一面；他有时敢于极言直諫，为民請命，但有时又表现为安分守己和明哲保身。一方面，他是一个偉大的关心人民疾苦的詩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封建王朝中食祿奉公的官吏；一方面，他是一个精神界的战士，但在另一方面，无可否认，他在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又是一个乐天知命、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庸人。然而，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思想上和生活上的这一些弱点，这一切，已經属于过去；白居易离开我们的时代已經很遙远了，他所生活着的和使他感到苦恼的那个人民处于无权状态的可詛咒的时代，也已經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但是，詩人白居易的一些千百年来膾炙人口的詩篇却还活着，沒有失去它們的生命力，它們是属于未来的、属于人民的最可宝貴的精神财富。

白居易的創作才能是多方面的，為了敘述上的方便起見，我們把他的詩歌分為諷刺詩、敘事詩和抒情詩三方面來考察，而沒有按照他自己原來的分類，即『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來敘述。不論是在諷刺詩、敘事詩、抒情詩或是其他的題材方面，他都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優秀的詩篇。指導着白居易進行創作的是他的政治觀點和文學觀點。特別是在他的《新樂府》和《秦中吟》這兩組詩里，這些觀點表現得更加鮮明而突出。在《新樂府》的序言中，他明白地告訴讀者，說他之所以要寫這些詩是有所為而作的，他是有意識地繼承着《詩經》以來的文學傳統，用詩歌來為他的政治主張服務的；『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意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諷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他反對那一些『嘲風雪，弄花草』的脫離現實生活和鬥爭的創作傾向。他在《策林》六十八、六十九中，論及文學和政治的關係時，也表示出同樣的觀點。在這樣的創作思想指導之下，白居易寫下了大量的詩篇，這一些詩都是有所為而

作的，为着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服务的，这是他的诗歌的主流，他的诗歌中的精华部分。但在白居易的诗歌中，也有一些篇幅，是离开他的这个创作思想的，或者簡直是和它相反的，他也曾写出了不少宣揚道家虛無思想和佛家出世思想的詩，這些都是无足取的，这是他的诗歌中的糟粕部分。此外，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他的同一时期的作品中，甚至在同一首诗中，精华和糟粕是揉杂在一起的，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影响的作品也是不少的。这需要加以审慎的区别和具体的分析。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諷刺詩占了很多的篇幅，这些詩大部分集中在他自己所編的『諷諭詩』里。此外，他还以寓言詩的形式写了不少諷刺詩。作者写这些詩的动机，本意是在給封建統治者看的，借此以进行『諷諭』即規劝的，希望他們看到了这些詩，能够有个回心轉意，反省一下自己的罪过，因此而幡然改悔；可是，在客观效果上，『諷諭』或規劝却变成了揭露和諷刺。由于客观的现实社会太黑暗了，作者情不自禁地把他的諷刺的火焰、他的尖銳的笔鋒，指向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統治者；在客观上，他成了被压迫被侮辱被損害的人民的代言人。他憎恨和詛咒种种不合理的制度、极端殘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剝削；他揭露那些封建統治者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同情人民的不幸，为他們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災难的生活而忧伤。在《采地黃者》、《重賦》、《伤宅》、《輕

肥》、《歌舞》……等一系列的詩中，他采用了鮮明的對比手法，写出了存在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間的不合理的現象。朱門里白面郎的肥馬飼料，正是从飢腸轆轆的貧苦的人們口中夺走的活命糧；破产的荒村中老人和孩子衣不蔽体，体无餘溫，而官家的倉庫里的綉帛絲絮却堆积如山，日子久了竟至化作灰尘。在《輕肥》中，白居易着重地描写了权貴們的奢侈豪華的生活，在結尾处，他指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歌舞》中，他着重地描写了权貴們日以继夜地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在結尾处，他指出：『岂知閹乡獄，中有冻死囚！』这是一种如何令人战栗的呼声！在《紅線毯》中，他憤怒地指責当时的官僚道：『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絲，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在《杜陵叟》中，他对于封建統治階級的最高統治者皇帝虽然仍抱有幻想，但他已忍不住满腔怒火，指出了：『剝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在《繚綾》中，作者尖銳地提出了『織者何人衣者誰』的問題，而他的答复是：『越溪寒女汉宮姬』。在这里，詩人虽然还不可能具有階級分析的观点，但他却朴素地观察出了封建社会里不合理現象癥結之所在。这样的对于社会生活的观察，白居易的前輩詩人杜甫曾在他的不朽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鮮明地表达出来，而在白居易的詩中，他的同情人民，憎恨权貴的弥足珍貴的感情，也表現得十分强烈。